

周立波短篇小说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罗川

周立波短篇小说选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 1/32 12印张 2插页 227千字

1979年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定价0.80元

目 次

第一夜·····	1
麻雀·····	8
阿金的病·····	18
夏天的晚上·····	25
纪念·····	34
牛·····	45
金戒指·····	54
懒蛋牌子·····	66
诸葛亮会·····	78
砖窑和新屋·····	88
李大贵观礼·····	92
盖满爹·····	106
桐花没有开·····	124
禾场上·····	144
民兵·····	151
山那面人家·····	159

下放的一夜·····	169
艾嫂子·····	175
张满贞·····	184
在一个星期天里·····	195
调皮角色·····	207
卜春秀·····	218
张润生夫妇·····	242
参军这一天·····	254
扫盲志异·····	265
翻古·····	281
新客·····	291
霜降前后·····	306
飘沙子·····	316
林冀生·····	329
胡桂花·····	341
湘江一夜·····	356
编后记·····	381

第 一 夜

拘留所的第一道铁门上的大吊锁关闭的响声，好象使得我的心脏跟着沉落了。就是这一声锁响，和锁上的不很粗大的扣环，把我同外边的世界完全隔绝，把我投进了一种还看不清前路的奇异的生活状态里面了。

“你来了？”关锁的响声，也惊动了睡在墙边地上几条破旧的灰色绒毯里面的一个人，他抬起了半截身子，这样地问我，好象我是他的老朋友。我知道他没有完全醒来。没有等待我的应答，他又放倒了身躯，发出了鼾息。

已经敲过了两点。夜很寂静。只有在第一道铁门外的院子里，二月的寒风有时刮得响。和着风，远处隐约的炮声和近边马路上汽车驰过的声音传进了囚房。第一道铁门内和第二道铁门外的水门汀走廊上，一个缠着黄头巾，嘴巴和脸颊都被稠密的黄褐色的胡子遮盖尽了的印度巡捕，缓步地来回地走着。他并不看我，一个人在小声地唱着一支凄凉的印度歌。我靠墙站着，不想睡，也不愿意推想以后的情形，想找一点新奇的轻快的事物，来占据我现在的心思。从走廊上照射进来的淡黄色的电灯光下面，除了墙边那人身上的一堆绒毯外，铁栅横格上，有一双竹筷和半张草纸，这

就是这个大房间里所有的一切。我的眼睛到处搜寻着，右边一板白色粉墙上，什么人用黑炭画了一只老鼠，后面有一只猫追赶。公正地说，这位艺术家的素描本领不算低。要是有人非难他，说他画的老鼠比猫大得太多了，我们也可以找到理由来替他辩护，也许是由于这里耗子多，给他印象太深的缘故。另外一板墙壁上，一位书法家用十分潇洒的歪斜体，写了两行粗壮的大字：“此地不来非好汉，再来不值半文钱。”那末现在我是一条好汉了。

墙壁上还有用竹签刻出来的文字和图画。微明的灯光下，要仔细地看，才看得清楚。但又觉得胸部在痛了。我走到一个墙角边坐下，背靠着墙壁，手揉着胸口的痛处。我又看见了那个高大的洋包探的红润的胖脸，和他用两手横拿着一根粗短的铁棍的样子。

“共产党员的头发总是留得很长的。”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爆发以后的第九天晚上，上海戈登路巡捕房写字间的翻译发现了这个自以为是的“真理”，用流利的英语告诉站在壁炉两边的两个外国人。所有的眼睛立刻集中我头上。大个子包探特别走到我的面前来，用英语严肃地问我，为什么头发要留这样长？是不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是这样的？留着长头发有什么秘密的用处吗？等等。由于趣味和智力的不同，对这些问题，我们两个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我看起来，这是一些痴呆的混蛋的问话，在他的眼里，却是很有修养的机智的研究。我不回答他，使他愤怒了，他从一张台子上，随手拿到一本有木板一样坚硬的封面的巡捕签到簿，以一种我来不及招架的速度，双手高举在空中，

用劲打在我头上，这一下本来不过一二十磅重，但我倒下了，我相信不是因为受不起一击，而是由于太疲乏。从下午两点被捕的时候起，工头引去搜住所，包探带去拍小照，回到巡捕房来搜身体，打手印，问口供，一刻没有休息过，弄得十分的困了。现在倒在水门汀的地板上，脸对着壁炉。烧得通红的炉子在向上迁移，渐渐地只剩了一团跳动的红色的火焰，不久又变成了浮游不定的许多黑圈圈，弥漫着墙壁，天花板和整个写字间，这以后我就不知道我的眼睛是张开，或是闭着，或是别的什么了。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蜷伏在写字间一角的一间铁屋里。这屋子的四面都是蒙着铁丝网的铁栏栅，样子很象兆丰花园关狮子的铁笼子，只是小一点，整个屋子只有我的身子的一半长，宽和长一样。睡在里面要把身子蜷成一个圈，不用说是很不舒服。我站起来，正想伸一伸腰杆，铁门打开了，一位穿蓝布短衣的矮小的同胞站在我面前，他就是问我的口供，说我“有得苦头吃”的中国包打听。他从衣袋里掏出我在今天下午已经亲近了两次的那副钢手铐，扣着我的两手的腕节，一句话也不说，带我走到写字间外的一条走廊上，这里和戈登路只隔一道低矮的围墙。越过安插了许多玻璃碎片的墙头，可以看见来往的车辆，红色的瓦屋，和微微摆动的街灯映成的人行道上的洋梧桐下的行人的阴影。这一切都显得迷人和可爱。在走廊的一端，转一个弯，由一道幽暗的扶梯，我们上了二层楼。蓝衫人转动一个房间的门的把手，从房里奔放出来的明亮的灯光映花了我的眼睛，过了一阵，才看见一个穿灰色短衣的中等身材的男子

站在房子的中央，正在和大个子洋包探谈话，一看见他的焦黄的脸色和浮肿的眼皮，就使我感到一种夹杂着嫌恶的激动。他就是和印刷厂的经理一道，说我煽动罢工，把我送到这里来的汤工头。

“你为什么用刀子砍伤他的手？”洋包探问我，到现在我才注意不久以前反剪我的两手的工头的右手，缠了绷带，用一条白布系着挂在颈子上。愤怒窒塞了我的呼吸，使我不能够说话。我的不做声也使包探发怒了。他从地上拣起一根粗短的铁棍，两手横拿着，向我的胸口撞过来。我举起带着手铐的两手来抵抗，左手腕节上的小圆骨受了他一下，痛得没有法子再举起，连带着没有受伤的右手一同垂下了。他的第二下就撞在我的完全失去防卫的胸部，我被撞得倒在墙边一把椅子上。在过去的日子的空气新鲜的早晨，我也常常在柳树下面行过深呼吸，在旷场上面拉过扩胸器，跑过五千米，而现在，使我难过的是我没有利用这些强健胸部的运动的成果，为人家，为社会，多做一点值得追怀的事迹，只是被愚蠢的洋包探用铁棍来撞了。这却使华探和工头暗暗地高兴，洋包探抛下了铁棍，于是，这三位肤色不同的男子满意地、肩并肩地走出了房间，带关了门，把我剩在房间里。关好的门又忽然开了，洋包探的有着金黄色头发的大头塞在半开的门间。

“明天枪决你！”

这样通知我以后，他又关了门走了。他想吓唬我，让我恐惧和悲哀。但我没有恐惧和悲哀，只感觉到十分的疲倦，想休息一下。靠在椅背上，我望着被街灯映得微微明亮的

有铁栏的窗户。窗外边的地面上起了一声小小的爆炸，接着半空里也来了同样的一声。这爆竹的响声，使我记起了今天晚上正是旧历的除夕，租界上悠闲的阔佬，正在用花炮和闸北日本人的大炮相酬和，来庆祝这个快乐的年节。我对于这事不感到兴味，比什么都要更坚固的占据我的心思的是我现在的处境。我痛楚，困倦，漠然的有一点忧愁，也想起了外边一些不很轻松的故事。曾经有人告诉我，一九二七年上海许多革命的年轻的男女，在四月的微寒的晚上，被蒋匪一个个用装米的麻布袋装着，用卡车运到黄浦江边上，再装进舢板，送到吴淞口外去，一袋一袋的被投进海里。后来有一天，我到北四川路横浜桥边一家米店去买米。把米量好，钱付清，正要离开店门的时节，我抬起头来，看见米店里墙边堆了好几百个麻布袋，袋里好象有些什么东西在颤动，再仔细一看，仿佛每一个麻布袋口都伸出一个人的头，有些有着蓬松的女人的长头发，有些是男子的光头。中国呵，一百年来历尽了灾难的我们的祖国，在你的土地上是不大好住的，就是买一袋子吃米，也会联想到你的多少悲凄和眼泪。

现在又想起了这件事，我察看这房间的所有的角落，没有麻布袋，只有一些铁棍和橡皮管。听说后者是动电刑用的。这里一定是刑室，也许我要上电刑，也许洋包探的话是真的，明天我要被枪决。我跳起来，走到一个窗子的前面，我要再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看得见的一段马路上有一辆有篷的马车驶过去，车里飘出一阵快乐的歌声，我们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这边正有深重的忧愁的心事，望得见的那边，

却有轻松的快乐的歌声。我也唱过歌，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从没有挂虑的飘流的生活结束了，朋友们不得不为衣食各走各的路以来，生活里就再没有欢笑的歌，也没有醉人的酒了。每天坐在排字房隔壁一间小房子里面，用手指和眼睛校对许多粗糙的坏文章。到晚上，脑子里面装满了颠颠倒倒的铅字和乱七八糟的校对的符号，不能立刻去睡觉。走上晒台，呼吸着清凉的夜气，仰望着缀满明亮的星星的广阔和神秘的天空，我真愿意我的两只手臂是两只粗壮的翅膀，能够向高远的不可知的境界里飞翔。

门开了，蓝衫人走了进来。他的一双露出狡猾的微笑的小眼睛好象对我说：“你想要飞吗？且不要走吧。”于是，一句话也不说，既不说明为什么叫我在房子里留好久，也不讲出现在要到什么地方去，他引我下楼，穿过走廊，经过一个大院子，进了我现在所在的囚房。解除了我的手铐以后，他看着印度人，清一清喉咙，笑着想说一句什么样子的笑话，但是看到我站在旁边，就改变了计划，依然一句话不说，把铁门上的吊锁用力关好就走了。

我还是坐在墙角边，背靠着墙壁，把眼睛闭住，想睡一睡。蒙眬里，许多的幻影在前面浮沉：大老鼠，麻布袋和洋包探的红润的胖脸。这一切又融成了模糊的一片，化为烟雾。烟雾消散了，现出了蓝色的天空和青色的山野。山边有一条漂着茶子树的白色落花的溪水，溪岸上一个赶牛喝水的赤脚的孩子唱着他的快乐的山歌，向我走来。他越离得近，歌声越嘹亮，我被惊醒了，睁开眼睛，重新看见了铁门外面的走廊上缓步的来回走着的印度人，他正小声地唱

着他的凄凉的印度歌，向我走来。从铁门的铁柱间望得见的一块天空渐渐在发亮。印度人停止了唱歌，把电灯关了。远处的炮声已经听不见，马路上的各种声音增加了。院子里来了一队早操的华捕：“向右转！”“向后转！”一个中国捕头的大声的口令，和许多皮鞋整齐地踏在铺了煤渣的地面上沙沙的声音，惊起了睡在墙边的那个人。他抬起头来，看见了我，很惊奇地揉他的眼睛。昨天晚上他分明和我打过招呼，好象我是他的老朋友，今天却不认识了。这一回他是真正醒来了。

麻雀

三天以前，上海提篮桥西牢五层楼上九号房间的小陈，在午睡时间，捉住了一只飞进铁门里来的麻雀。他从白色斜纹布的囚衣的袖子上，撕下两片小布条，缚住它的脚和翅膀根，藏在叠着做凳子坐的三条绒毯的背后。晚饭后，这件事情被许多人知道，近边几个房间里的年轻点的人都要求传过去看看。在外面，谁都不会欢喜麻雀这种过于平常的小鸟，但在囚房里，它变成了诗里的云雀和黄鹂。我们喜欢它，因为它是自由的飞鸟，就在这天的上午，它还浴着阳光，也许还沾着草上的露水，在广阔的天空中飞翔，在街树的密叶里跳跃和啼叫。这使我们神往。我们中间有的人，已经整整的四年，没有看见一根青草，一片树叶了。我们抚爱它，好象要从它身上，寻找那甜蜜的自由生活的痕迹，闻嗅那清新的草和树叶的芳香。我们亲近它，好象长久地离开了家乡的人，看到了一个刚从家里出来的亲人，竭力想要从他的服装上、谈吐间，闻到一些盈满了我们童年的爱和欢喜的记忆的家乡的水土的气息一样。

传到我们房里来，我把它放在手掌上，要它尝尝我们特别为它留下的饭粒。它不吃，眼睛只望着铁窗子外的一小

块还很明亮的天空，拍动它的小翅膀，想飞出去。它真象一个第一次被捕的囚人，没有食欲，而且是极度的不安和焦躁。

关于它的放和留，引起了争论，有人主张立刻放了它，有人主张留三天。

“为什么要留它三天呢？我们判它三天徒刑吗？”十二号房间的小柳说。“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被关在这里面，我看也没有十分的必要。”阿金笑着说。

“我们不是麻雀。从敌人的观点来看，关起我们来是很必要的。而现在，我是说现在的这件事，我们都不是小孩子……”

“我们革命者是应该玩麻雀的么？”小陈插嘴说。他是小柳的崇拜者，很快的站到小柳的一边，忘记了捉这麻雀的就是他自己的一双敏捷的手。“不，告诉你吧，我们是不应该玩小鸟的，这和我们信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真理，太不相称了，我的好同志。”他特别喜欢用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他的论敌。

“这和伟大的共产主义的真理有什么抵触呢？”阿金问。“你忘了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吗？我们的房间只有十一只脚板长，五只脚板宽。我们没有书看，没有工做，一天到晚只是看着同样的铁窗，同样的印度人的大胡子。这些印度人，在他们觉得合适的时候，走过来说一句：‘巴古巴古有格？’猥亵的笑笑走开了。那些英国人，又在他们觉得合适的时候，走过来骂一声：‘野杂种！’把左手的大拇指挂在制服左

边的上口袋的扣着的铜扣上走开了。这是我们每天的生活，起初我们觉得难受、愤怒，到后来，连这也不了。所有的时间都是平板和无聊。突然一下，一只麻雀飞进你的房间来，你要捉住它，但是你又想：不，我们革命者是不应该玩小鸟的，你会这样么？对了，你没有这样，这给了我们很多的快乐，现在你倒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我觉得可惜，我的好同志。”用这末一句，他摹拟着小陈的口吻结束了他的雄辩。

这样热烈地继续争辩着，两方面都用许多漂亮的理由进行厉害的攻袭，想战败对方，但是两方面都很快乐。至少，我们是有了一个新的争辩的题目来消磨一个很好的黄昏，有了一个初从外面进来的小小的新鲜的对象供我们抚摸，容受我们所有的喜爱和温存，也使我们的心神飞驰到阳光照着的青色的野外，暂时忘了眼前的狭窄和灰黯。我们大家同意把麻雀留到第二天中午再放，并且请它顺便带封信出去。这又是阿金的奇想。我们也都认为这是顶好的主意。我们不能给外边写信。记得一年多以前，上海革命互济会用了许多钱设法买通了狱卒，带了一封慰劳信进来，这是怎样一件使人不能忘记的大事呵！在那一个珍奇的春天的晚上，四围很寂静，听得见远远的马路上迟归的电车驰走的声音。我们站在房门口，头靠着铁门上的圆柱子栏杆，倾听那封信的报告。为了提防抄靶子，信不传看，由前面房间里一个人报告，后面的这些并排着的房间，挨次有人作传达。听到那传达者用颤抖的声音吐出的句子，我们快乐，兴奋，紧握着同房间的人的也在发烧的手，说不出话来。我们

整夜地咀嚼着信里的每句话。那一夜和以后几夜，我都听到近边几个房间里有轻微的脚步声，轻轻的咳嗽声，都睡不着，都在想念外面的同志和朋友。他们很忙，很辛苦，但他们还记得我们。现在他们都好吗？我们是好的。我们要藉着这奇异的信差，让他们，让所有的外面的人们知道我们现在所认识了的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一方面把麻雀传到各个房间去，让大家看看，一方面商量信的内容和写法。没有纸和笔，在平常，我们把肥皂作成酱，很匀的涂在粗糙的草纸上，干了的时候，纸面会平滑得象油印用的蜡纸一样的，可以用小小的尖竹签在上面写字。现在我们没有这种现存的纸了，大家推举小陈做，因为他做得最好，他也写得好。于是我们决定待到第二天，我们的这种信笺干了的时候，由小陈写上这样一句话：

请爱惜你的每一分钟的自由，朋友。提篮桥监狱囚人启。

也有人想到，折叠起来，用一根从衣上扯下的棉线，把它缚在麻雀的腿上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好不至于把字句磨损。

我们享乐着这种通信的神秘的情味，纷纷地预测这张条子的各种可能的命运。有人以为也许会凑巧的落在一个革命同志的手里，使他知道好好地利用自由的生活，更多的享受战斗的欢喜。又有人说，上海自杀的人天天这样多，我们的字条也许会落在一个这样的人的手里。走到黄浦江边上，因为失恋或失业，他要跳江了，忽然看见一只麻雀飞落

在他的近边的草地上，正在用嘴壳啄他腿上的什么，由于死神的临近也不能够赶走的人类的好奇心，他走拢去看，麻雀飞走了，遗落了我们的条子，“请爱惜你的每一分钟的自由”，说得多么好，他想着，“简单，却是十分重要。”于是他会觉得虽然没有爱情，或是没有饭吃了，他还是有着人生里面最宝贵的东西，嘲笑他一分钟以前的自己的情绪，他走回马路，重新看到了街树、阳光和走着的人们的微笑，重新恢复了为别人和自己做一点事情的力气。

但也有人推测这封信会落在荒地上，或是什么弄堂里的幽暗的角落里，谁也看不到，冷落的躺在那里，一直到无情的雨水把它打湿，销毁了的时候。另外又有人驳倒这一个推测，说上海的荒地少，人口多，字条子一定会落在什么人手里。

“但要是落在一个资本家的手里呢？”小柳忽然发问道，“那我们不是等于请他爱惜每一分钟剥削工人的自由吗？”

“不会的，”阿金说，“上海三百多万居民中，有八十多万是产业工人，二十多万是学生，还有无数的小市民和城市贫民。他们都在街头上。最大的可能，我们的信差会被他们看见，说不定会被小陈厂里的一个小姑娘看到。”

“这样说起来，小陈是在准备写情书的了。”有人说。

“瞎三话四！”是小陈的声音。他的同房间的人笑着宣布他的脸红了。

“你真是想着你在向一个小姑娘写情书吗？”爱说笑话的阿金找到了题目，“但是，小陈，不是故意要打破你的幻想，使你失望，我只是要把实在的情形提醒你，上海的老太

婆是和小姑娘一样的多，你的这封信，也许会落在四十年前或是五十年前曾经做过小姑娘的一位很好的老太太手里。那也不错，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爱情，我们高兴小姑娘为了我们害一场很厉害的相思病，也需要老祖母的慈爱。那位老太太看到了这封信，会很感动的说：‘可怜的孩子，自己不自由，倒在关心别人的自由了。’这样说着，她会掉下眼泪来。”

我们闲谈着，时常发出快乐的笑声，这是在牢监里的十分愉快的一晚。不知不觉到了九点钟，这是英国人查第一次夜差的时间。平常我们早就警戒了，停止了谈笑，躺在绒毡上假睡，听到每一层楼的楼梯口上的铁门的开关，和英国人的皮鞋的脚步，一层楼一层楼地响过，上来，听到他从我们房间前面的走廊很快的走过了，大家又起来谈天。今天晚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麻雀从后面的房间传回，传到十二号房间的隔壁，小柳伸手到门外去接，没有接到麻雀，手被一个人的皮鞋踢一下，通夜不熄的昏黄的电灯的光亮里，二十七号英国人的高大肥胖的身子显现在他的房间的前面。

二十七号是狱卒里面的有名的人物，他的有名，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全监狱的所有的橡皮鞭体罚，都是由他来执行。他的样子不凶恶，红润的、丰满的脸上倒是常露着笑容。但他有一个特别的脾气，有时从走廊上走过，走得非常快，好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去办，或者可以说，好象什么地方失了火，要他去抢救。于是突然，常常是出人意料的，他停止在什么人的房间的前面，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